

王懋竑《朱子年譜》探賾 與朱學宗旨之辯

游 騰 達^{*}

提 要

王懋竑的《朱子年譜》堪為考證與研究朱熹生平事蹟的代表作，然該書中對於朱熹確立學問觀點的論斷卻大異於當前學界的研究成果，亦即稱「中和新說」為未定之論，故本文以此為研究之出發點展開探討。

首先討論其立論之原委，發現《年譜》之論應是針對朱澤澐《朱子聖學考略》一書而發，蓋朱氏此作強調當以己丑年（四十歲）的中和新說之悟為朱熹的學問核心，並依之創發個人獨特的朱子學詮釋觀點——「主靜」說。於是，王懋竑乃特立「主敬」說與之辯駁，堅稱朱熹於當時猶多「未定之論」，須遲至隔年（庚寅年，四十一歲）拈出「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始為朱熹終身守之不易的學問宗旨。

又王氏編撰《朱子年譜》言：「朱陸異同是立譜大關鍵」，故本文繼之考察明代中葉以來「朱陸異同論」的發展脈絡，得知自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風行後，以文獻編年考證的方式，檢核朱熹學思歷程的演變，探討何為晚年究

本文於107.11.13收稿，108.06.05審查通過。

*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DOI:10.6281/NTUCL.201906_(65).0004

竟之定說，成為學者們回應「朱陸異同」問題的基本思考模式，例如魏校、高攀龍、秦雲爽、陸隴其、童能靈等人皆有相關的論述或著作，而朱澤澐與王懋竑兩人的研究成果可說是此一學術思潮的重要結晶。

故本文之作，一方面針對王懋竑的《朱子年譜》進行義理探源的工作，一方面則以朱熹學思歷程為考察線索，梳理「朱陸異同論」這一學術公案的發展脈絡，進而呈現朱子學詮釋的多樣面貌。

關鍵詞：王懋竑、朱子年譜、朱澤澐、朱陸異同論、清代朱子學

An Exploration of Wang Mao-Hong's *The Chronicle of Zhuzi* and the Disputation on Zhuzi's Philosophy

Yu, Teng-T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e course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Zhu-Lu itong lun” from the mid-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when Wang Mao-Hong completed *The Chronicle of Zhuzi*. During this period, scholars discovered that relying on textual research was the only correct method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Zhu Xi's doctrines. Based on this method, Wei Xiao, Kao Pan-Long, Qin Yun-Shuang, Lu Long-Qi, Tong Neng-Ling and Zhu Ze-Yun all put up different points. Among those, Zhu Ze-Yun's points brought about arguments from Wang Mao-Hong that were written in *The Chronicle of Zhuzi*.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course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iling of Zhu Xi's doctrines are meaningful for the discussion of “Zhu-Lu itong lun.”

Keywords: Wang Mao-Hong, *The Chronicle of Zhuzi*, Zhu Ze-Yun,
Zhu-Lu itong lun, the studies of Zhu Xi in the Qing Dynasty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inophone Studi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王懋竑《朱子年譜》探賾 與朱學宗旨之辯^{*}

游 騰 達

一、前言——問題緣起

欲研究一代學人之義理思想，由其著作、相關文獻材料與年譜入手，是最基本的研究途徑，是以，欲了解宋朝朱熹（字元晦，號晦庵，1130-1200）的學術思想，多半不會跳過清代學者王懋竑（字予中，號白田，1668-1741）所編纂的《朱子年譜》一書。

王氏的《朱子年譜》之作，在學術界中享有極高的聲譽，例如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1873-1929）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便特別表彰王氏此作能盡力蒐羅客觀事實，將諸材料來歷調查得清楚明白，忠實地說明真相，更考訂許多偽託朱子的書（或朱子未成，由後人續纂者），如《文公家禮》、《通鑑綱目》、《名臣言行錄》以及《易本義》（前九圖、筮儀）等。因此，可謂「科學的研究朱子」之代表。¹而錢穆（字賓四，1895-1990）的同名之作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2018年08月22-23日復旦大學哲學院、復旦大學上海儒學院主辦「宋明理學國際論壇——暨上海儒學院第二屆年會」。此次發表，特別感謝審查委員們提供詳細且具體的評論以及寶貴的修改建議，筆者受益良多，本論文多有採納修訂，於此敬表謝忱。

¹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頁145-148。案：以考據成果言王懋竑研究朱子學之成就者，還有林慶彰的〈王懋竑的朱子學〉一文，見《清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209-232。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雖然對王懋竑仍未脫門戶之見，不無非議。²但於〈王懋竑學述〉一文，則稱許王懋竑為「能以考據治朱學之唯一人物」，「可為宋、明六百年理學作殿軍者」。³此外，張舜徽（1911-1992）所著《清代揚州學記》，也列有專章討論王懋竑所處的時代背景、生平經歷、治學上的努力及其著述作品等，且最終歸結王氏的朱子學研究方法與學術地位為：「運用考證家的治學方法，去整理朱子之學。融會貫通，而不拘隘。這對後來揚州學派的走入『通核』一途，無疑作了『導夫先路』的前驅者。」⁴

縱然如此，可是當我們通讀《朱子年譜》一書時，卻會發現一個令人大惑不解的問題，即就當前學界對朱子的學思發展歷程之研究成果言，朱子年輕時曾苦參「中和」議題，於己丑年（乾道五年，A.D. 1169）終有一番新的領悟（亦稱「中和新說」之悟），這無疑是他學問確立的根本關鍵，⁵然而王懋竑在其著作中卻三番兩次地申明「不可執己丑一悟以為定也」，⁶且當關涉到此一「中和新說」之悟的相關文獻時，他更反覆強調這些文獻材料不足為憑，例如：「按〈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皆在己丑之春，蓋乍易舊說，猶多未定之論。」「〈與張欽夫（諸說例蒙印可）〉一書當在〈與湖

²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年），第16冊，第七章，頁365。

³ 錢穆：〈王白田學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冊，頁310、301。

⁴ 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顧亭林學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5年），頁29。

⁵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73-180、192；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頁96-111；（日）友枝龍太郎：《朱子の思想形成（改訂版）》（東京：春秋社，2002年），頁90-101。

⁶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朱子年譜考異》，卷2，頁331。案：本文引用王氏所作《朱子年譜》據依此本，下面不再詳註出版項。

南諸公書〉之後，亦已丑答也，其中亦多未定之論。」⁷ 這不禁啟人疑竇：他何以會提出這樣的論點？他何以要如此堅決地否定朱子己丑之悟的重要性？由此或可推想，這般執意地反覆強調，當有其針對性，則其立說之論敵為誰？

查王懋竑編纂此《朱子年譜》時，為他所參酌的往昔《朱熹年譜》之版本有李默本、洪去蕪本以及閩本，此外，他也參考了鄒琢其的《朱子年譜正訛》一書，這是學界所熟知的。⁸ 但上述王氏對於朱子學思歷程的獨特主張——否定「中和新說」之悟對於朱子學說確立的重要性，並未出現在這些先前的《年譜》著作中，故由版本文獻的淵源考察恐無法探知此特立獨行之論的由來。不過，針對王懋竑的相關研究中，多半會提及他的同鄉學侶——朱澤澐（字湘淘，別號止泉，1666-1732），而此一學術關係網絡的線索正為上述的疑問開啟一個突破的窗口，蓋朱澤澐與王懋竑的互動極為密切，兩人不僅是同鄉，更易子而教，甚至發展為姻親關係，⁹ 且朱氏著有《朱子聖學考略》一書，該書中的主要觀點更曾激發王懋竑與之論辯，因此，下文將由朱澤澐的論點開始說

⁷ 《朱子年譜考異》，《朱熹年譜》，卷1，頁311-312。案：當代學者牟宗三便曾高度視此問題，他在其所著《心體與性體》（臺北：正中書局，1990年）一書中特立一專節討論之：「王懋竑認新說『亦多未定之論』之非是」，見該書第3冊，頁154-175；然其說側重辨析王氏之說的錯謬，對於王氏何以發此議論，則尚未加以考察。

⁸ 案：關於針對《朱子年譜》之文獻學的研究，參考容肇祖所作〈記正德本〈朱子實紀〉並說〈朱子年譜〉的本子〉與〈跋洪去蕪本〈朱子年譜〉〉兩文，收入《容肇祖集》（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頁105-169。（日）山本仁：〈朱子學關係文獻の再検討〉，（日）有田和夫、大島晃編：《朱子學の思惟：中國思想史における伝統と革新》（東京：汲古書院，1990年），頁437-491。又關於李默本《年譜》的研究，參考（日）佐藤仁著，石立善譯：〈論李默本《朱子年譜》——與明代學術的展開相關聯〉，收錄於吳震、吾妻重二主編：《思想與文獻：日本學者宋明儒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01-112。

⁹ 案：學界對朱澤澐的關注，多以其作為王懋竑之學侶而附論之，如錢穆、張舜徽之作，而楊菁〈朱澤澐的朱子學〉一文，則屬專論朱氏之學的先聲，對朱澤澐的朱子學觀點有一通盤的概述。見祁龍威、林慶彰主編：《清代揚州學術》（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頁119-146。

起，繼之，闡發朱澤澐、王懋竑兩人的爭辯焦點，進而探究王懋竑《朱子年譜》一書立論的原委；最終，回溯到朱子學發展史的學術背景，論析彼二人的撰作動機，實是試圖透過堅實的文獻考訂與繫年的工作來回應眾說紛紜的「朱陸異同」論這一難題。

二、朱澤澐的「主靜」說與王懋竑的反對意見

承上所述，讓我們先來看朱澤澐的《朱子聖學考略》一書。

《朱子聖學考略》¹⁰一書，可視為一編年體的朱子文獻選集，全書共計十卷，寫作目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闡明朱子學思的發展歷程，二是糾正歷來「朱陸異同」論的種種錯謬，證明無論早年或晚年，朱、陸兩人實「無毫髮同處」。¹¹

（一）朱澤澐論朱子的學思歷程與「主靜」說

關於朱子的學思發展歷程，他在該書的〈自序〉中有如下的表述：

自見延平使用力存心養性，……延平教以合心理氣之說，當見用力處。三十以前已有察識端倪、涵養端倪工夫，延平既沒，悔其未得未發之旨，與南軒反復參究，至四十而恍然。又十數年而丙申、庚子，更加涵養，形於答書。是朱子自用涵養未發工夫，屢進屢深，學如不及之意，自有如此境地。至丙午、丁未而動靜合一，包羅含弘天地萬物之理，歸宿於此。至庚戌而聖學純，後十年則涵養益純，而幾於化矣。¹²

¹⁰ 清·朱澤澐：《朱子聖學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民國刻本），以下本文徵引此書均以據此版本，且簡稱《聖學考》，不再詳註出處。

¹¹ 同前註，卷10，頁18下。案：關於朱澤澐全面檢討與批判歷來「朱陸異同」論諸說之理據的相關研究，參考游騰達：〈論朱澤澐《朱子聖學考略》對「朱陸異同論」的文獻探析〉，《東華漢學》第14期（2011年12月），頁109-148。

¹² 《聖學考》，〈自序〉，頁3上-下。

這段引文，朱澤澐先從朱子拜見李侗（字愿中，稱延平先生，1093-1163）開始說起，因為他認為：「朱子自見李先生後，深究聖賢言語而實體之，是第一大關」，¹³而此時，朱子猶未能參透「體認未發之中」的奧旨，所以，又有三十八歲的長沙之行，此行與張栻（字敬夫，號南軒，1133-1180）會面論議，激發朱子「中和舊說」之悟：將日用間動靜語默之生命活動概以「已發」目之，而「未發」之大本便內具其中，所以，工夫當由已發處「察識端倪」下手。但是到了己丑年（四十歲時）卻驚覺前說缺欠涵養未發的工夫，於是又有「中和新說」之悟。

不過，朱澤澐認為在己丑之悟以後，朱子的學思發展並未就此停住，他主張若說己丑以前，朱子的核心論旨以「動」為主，著力於察識已發之端倪的工夫路數；己丑以後，則知曉持敬工夫當貫徹乎動靜兩端，但必以「靜」時的涵養本體為根本，朱澤澐說：「大抵朱子己丑前以動為重，己丑後敬貫動靜，而以靜為本，此進學之最要緊、最顯明者。」¹⁴且在此之後，「又歷十二年至丙午，主敬親切，動靜合一，是又一大關」，¹⁵意即朱澤澐稱朱子在丙午年（淳熙十三年，年五十七歲）已達到「動靜合一」之境。猶有進者，朱子的學思發展至庚戌年（紹熙元年，時年六十一歲）復有一層轉進，他說：「朱子是時久已造一貫地頭，……玩『聖人之心無所不到』數語，尤見朱子之心已純是天理，仰觀俯察一切應用皆是此理，所以庚戌有『見得分明』、『理會得恁地』之語。」¹⁶而到了朱子辭世之前三年（丁巳，慶元三年，六十八歲）終達至「此心即前聖之心、天地之心，許多道理融會貫通，直到左右逢原，大成時候也」¹⁷的究極境界。朱澤澐又寫到：

朱子涵養直接孔、孟者有數層：四十前，只在發念正大、敬畏、小心處

¹³ 同前註，卷1，頁2下。

¹⁴ 同前註，卷2，頁5下。

¹⁵ 同前註，卷6，頁21上-下。

¹⁶ 同前註，卷7，頁78下-79上。

¹⁷ 同前註，卷10，頁65下。

用功，是一層，察識端倪工夫也。四十悟本體未發，心統性情是自己本領，隨事觀理，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是又一層，主敬御動也。丙申又悔涵養工夫少，如〈復齋記〉所云：「不肆焉以聘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在。」又云：「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為內外之分。」此又一層，即動亦敬動靜皆敬也；至丁未、戊申，動靜周流，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此又一層，動靜合一，敬貫動靜，渾然一理也。至庚戌以後，純是天理發見，如太極在陰陽之中，即陰陽即太極，即動靜即天理，只是天理欽舒，不得以動靜言，敬渾是理，不見動靜矣。¹⁸

將這段引文與前面的說解合觀，可見朱澤澐對於朱子學思歷程演變的考察極為精細詳密，除了說明朱子參悟中和新舊說的曲折過程外，他還仔細闡述了朱子四十七歲、五十七歲、六十一歲以及六十八歲等時期的思想遞嬗之軌跡。其說法之穩當、正確與否，當可再加以討論，¹⁹不過，他的朱子學研究觀點（朱子為學歷程說）在爾後，確實引起王懋竑的注意，致使他在《朱子年譜》中特意加以回應。

但朱子晚年的思想演變尚非朱澤澐最重要的研究心得，他最獨具個人特色的論點在於主張「己丑，朱子悟未發之中之旨，是聖學大關鍵」，²⁰而他對中和新說的理解，不僅僅是心通貫於已發、未發兩時節，故持敬工夫不分動靜兩端，更加要緊的是，他認為朱子中和新說之悟，其核心要旨在體認得未發本體，故修養工夫當以涵養、保任此形上本體為根本，所以，他強調朱子之學以「靜」為本。

是以，在《聖學考》一書中，朱澤澐乃不憚其煩地摘錄大量的書信與語錄

¹⁸ 同前註，〈提要〉，頁7下-8上。

¹⁹ 案：筆者另撰有一文，乃以朱澤澐的「朱子學思發展歷程六階段」說為例，詳述其所理解之朱熹思想的層遞發展與義理轉折，且將回歸到朱子的文獻本身，考察其立論理據之當否；同時也會參照當前之研究成果（如束景南、友枝龍太郎等人），得見其說法之優劣與啟發性。

²⁰ 《聖學考》，〈提要〉，頁10下。

材料來呈現他的這點發現，例如：

朱子己丑透悟即著實用涵養工夫，如〈答林擇之〉前三書附載於後、子直所錄，其最顯著者，……即此知朱子於持敬中見仁體自然昭明呈露，歷歷可驗如此。子直所記前二段，朱子自道向來未曾專用功於本體，以示學者；後五段，就近日所見親切全在安靜涵養本體，以示學者。合觀之，朱子自學、教人諄諄以涵養本體為主，後來無窮工夫皆基於此二、三年間。²¹

也就是說，朱澤澐對未發時的心性內容與涵養工夫，有其個人獨到的體會，且當該注意，他體認得未發之際是尚未與外物交接，念慮尚未萌發之時，此刻湛然的心中，實含容充塞萬理於其中，朱澤澐云：「其未發也，萬理森列於中，昭昭不昧」，²²甚至可說，當此未發之際，澄然之心中渾是本來之天理。²³故「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一心湛然，萬理皆備，此是未發本體，涵養兢兢，纔有把柄。及其動也，敬以察之，克治擴充，總此一源貫注。」²⁴因而，也可以說，朱子在己丑之悟後所主張的未發涵養工夫，旨在涵養未發本體，保守此未發氣象，使之常存而不失。是以，此未發時的靜涵工夫實是「萬理渾然之涵養」，²⁵具有本質性的修養意義，後來的動時省察、克治擴充等工夫皆奠基於此，而非只是一可使心氣轉為澄明靜定的調控、助緣之工夫（為之後的格物明理工夫做預先之準備的輔助性修養方法）。所以，朱澤澐一再強調「主於靜」、「以靜為本」的說法，正是對這一點的高度顯揚與強調，而這個觀點卻也引發王懋竑的強烈質疑與反對（當然，其中也有王懋竑誤解朱澤澐「主靜」說的成分在）。

²¹ 同前註，卷2，頁29下-30上。

²² 清·朱澤澐：《朱止泉先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乾隆四年刻本），卷2，〈語錄〉第121條，頁25上。

²³ 朱澤澐言：「事物未至，思慮未萌之時，此心渾是本來天理，即程子所謂仁體。」同前註，卷8，〈共學山居講義〉，頁13上。

²⁴ 同前註，卷3，〈與戴西洮〉書一（承惠聖學吃緊三關），頁20下。

²⁵ 《聖學考》，〈提要〉，頁8上-下。

（二）朱澤澐與王懋竑間的「主靜」與「主敬」之辯

據《朱子聖學考略》書末〈附錄〉，止泉門人王咸傳（王懋竑之次子）所作〈聖學考略辨偽〉所言：「先生成是書，覓人謄寫清本，囑先君子刪訂。」²⁶又王懋竑〈行狀〉亦載：「朱公著《聖學考略》既成，甚不自信，諄囑府君是正，而以府君所纂訂《朱子年譜》為絕大關繫，力促速就，屬望尤至。」²⁷可見當《朱子聖學考略》一書草就之際，朱澤澐便立刻請人謄錄乙冊，寄呈王懋竑，與他一同研議，並冀望獲得斧正。

然而或許該書篇秩甚夥、涵蓋問題層面既廣且深，也可能是王懋竑平日累於公務，故對於《聖學考》的觀點交流推遲了數年，直到雍正八年（庚戌，A.D. 1730 年）左右，兩人才展開正面的意見交鋒。如下面朱澤澐致書王懋竑云：

昨承老兄商動靜工夫云：「朱子於延平靜坐之說，晚年頗不以為然。且以〈行狀〉所云：『舊日下得語太重』，只未發則靜存，已發則動察。」誠然！誠然！但朱子此意謂不可討要靜坐，一向如此耳。其實主靜工夫不可不著力，〈太極註〉云：「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又云：「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本義》〈恆〉卦註云：「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為主。」〈艮〉卦云：「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太極說〉云：「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玩此數條皆是動靜存省，而以靜為主。至〈答徐彥章〉書兩言「靜為主，而動為客」，最為精密，所當潛玩；「中和、動靜尤為大義」數語，與〈答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同意，晚年立教亦是如此。²⁸

²⁶ 同前註，〈附錄·聖學考略辨偽〉，頁5下。

²⁷ 清·王箴聽等：〈皇清敕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先考王公府君行狀〉，收入清·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乾隆十七年刻本），頁25下-26上。

²⁸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4，〈答王予中 庚戌八月〉書六（昨承老兄商動靜工夫），頁6a-b。

上文曾說明朱澤澐對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的「主靜」涵養工夫有其個人獨到的體會（體證未發心境，使之常存而不失），因此，在《聖學考》中再三致意，隨處提點。關於這一點，王懋竑頗不以為然，於是他想透過朱子晚年對李延平主張「默坐澄心」以體認未發之中的反省、批評來提醒朱澤澐不宜主張太過。然而朱澤澐解釋朱子對延平教法的批判、反思，不過意在申明不可一意尋討靜坐，這是朱子一貫的主張。且更緊要的是，他再次重申「主靜」工夫是確然不可不著力領會的，因為諸如〈太極圖說解〉、《周易本義》中〈恆〉、〈艮〉兩卦註、〈太極說〉、〈答徐彥章〉書等關鍵文獻中皆有相關的論述，可見朱子至晚年始終不改「主靜」之教法。

可惜在此函之後，王懋竑的答覆未見留存。不過朱澤澐於收悉王氏之覆函後，又有以下之書函：

又「以靜為主，動為客，朱子晚年不如此說」，恐未盡然。《易》註、〈太極註〉朱子所最斟酌者，而重靜之說，《易》註凡二見，「太極」註凡三見，《語類》十二卷載劉履之、沈莊仲錄沈錄云：「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是晚年語，皆如此說。實我輩用功切要之旨，似無可疑。高明以為何如？²⁹

「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一語，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徐彥章〉書中凡兩見，³⁰朱澤澐認為此正足以為其「主靜」說之確證，蓋因此兩函為庚戌年（朱子年六十一歲）所作，代表朱子從己丑之悟至晚年始終維持原論，未有移易。然而此證卻遭到王懋竑的堅決反對，他堅稱「朱子晚年不如此

²⁹ 同前註，卷4，〈答王予中〉書八（昨老兄所言），頁8上。

³⁰ 案：即宋·朱熹撰，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4，〈答徐彥章〉書二（示喻主善之云），頁2581、書四（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一），頁2582。以下本文凡引用《朱子全書》者，俱依此版本，故不再詳注出版項。朱澤澐於《聖學考》中將此兩函繫於「庚戌年·朱子年六十一歲」下，見《聖學考》，卷7，頁52下-54上。

說」。因此，朱澤澐便再次重申其主要論據（如《易》註中兩見、〈太極〉註中三見），並追加徵引了《朱子語類》卷十二劉砥（字履之）與沈憫（字杜仲）兩人所載朱子晚年語以為己證。

然則朱澤澐的論點始終未獲王懋竑的信服，所以在隔年（雍正九年・辛亥，A.D. 1731）朱氏復追書一封詳列更多的論據，以申述「主靜涵養，以靜為本之訓，所以註釋經書，垂教後世者，一定不可更易。」「以靜為主之訓，自是不易之論。」且在文末，更將他個人對「主靜」說的深刻體會和盤托出：

誠能從博聞強識、躬行力踐，統會於宥密深靜之中，積累涵蓄，存省工夫無間於動靜，而必以無欲之靜為主，功深力到，萬理渟澈，則當未有感觸之時，此心澄然，天理具在，儘有意味，愈涵養愈深沉，即應事接物，此心此理仍是靜時氣象。此朱子中年、晚年深有望於朋友、及門，諄諄懇懇見於《文集》、《語錄》，而不能自己者也。³¹

文中朱澤澐再次試圖說服王懋竑：存養與省察工夫雖分屬動靜、已發未發兩端，不過，用功之關鍵必以無欲之靜為主。再進一步，剖析言之，則是當事物未至，未有感觸直覺的活動之前，體認此心寂然澄澈，卻有渾然之天理含存其中的未發氣象，並加以保任、涵養，如此一來，縱使在應事接物之際，此心此理仍是未發（靜）時之精神狀態。朱澤澐認為這就是朱子自中年以迄晚年見存於著作之中，以深望於友朋、門人弟子的修養工夫與成聖境界。言至此，不難領會朱澤澐對朱子的「中和新說」自有其一番迥異於他人的深刻領悟，這也是他為什麼始終堅持朱子之學「以靜為本」的原因所在。

然而就目前王懋竑留存的文獻資料來說，上面的幾番書信往來，均未見王懋竑的覆函，現存可見者為上函的次年（雍正十年，壬子，A.D. 1732）王懋竑決意撰作一長文進行全面且嚴正的批駁朱澤澐「以靜為本」的說法，該文甚長，僅錄其要者如下：

³¹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4，〈答王予中 辛亥〉書九（弟以久病），頁10下-11上。

夫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呼則必吸，吸則必呼，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此固不可以少偏者矣。周子〈太極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推其說以為：「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於靜」。《易本義》於〈恆〉、於〈艮〉皆本此義，然南軒先生已疑與「無欲故靜」之指不合，而《易本義》乃釋「終則有始，各止其所」之義，固非以為學問之通法也。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皆垂世立教，開示學者次第工程，一定不易之法，則未嘗一言主靜！……若《大學或問》極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中庸或問》言「未發之前，敬以存之；既發之後，敬以察之。」尤為明白切實，而未嘗有主靜一字也。³²

王懋竑首先說明他對「動／靜」這組概念的理解，他認為「動／靜」猶如人之「呼／吸」，乃是循環不已，互根相續的概念；若分以兩時節論之，則動、靜兩端各有其修養施力的著重點。由這點來看，以「動／靜」立論，不宜偏主一隅。再者，針對朱澤澐的諸論據，如朱子於〈太極圖說解〉雖言「其動也，必主於靜」乃在詮解周敦頤（字茂叔，人稱濂溪先生，1017-1073）〈太極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一語；而《易本義》〈恆〉、〈艮〉兩卦之註解亦本此而發；況且朱子的這個詮解觀點已遭張南軒指出恐與濂溪自註「無欲故靜」一語不合。甚至其所引述《易本義》之論據，其實只是釋卦文字，非學問之通用法則。尤有甚者，揆諸允為朱子學說定論的《四書章句集註》與《四書或問》等書，只見「敬貫動靜」、「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之說，而未嘗有一語論及「主靜」二字。又言道：

〈未發已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為本」之說，其與何叔京、林擇之、石子重、胡廣仲諸書，多主此意，考其時皆在壬辰、癸巳間。至答南軒書在三十二卷之末，與〈未發已發說〉同時，其中多未定之論，如云「以

³² 《白田草堂存稿》，卷11，〈王子答朱湘淘書〉，頁20上-下。

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與〈圖解〉相反，壬辰乃改從今說。……故雖以敬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至壬辰、癸巳皆然，甲午、乙未以後則不復主此說。³³

不只〈太極圖說解〉與《易本義》的〈恆〉、〈艮〉兩卦註無法作為立論依據，而且撰作於己丑至癸巳年間的諸多信函，如〈未發已發說〉與〈答張欽夫（諸說例蒙印可）〉書等，皆屬未定之論，實不足為憑。比如〈答張欽夫（諸說例蒙印可）〉書有言「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³⁴但數年後的〈太極圖解〉則重新調整「中正仁義」四字的配對，稱「中也，仁也，感也，……正也，義也，寂也。」³⁵對於中正仁義的配對詮解，已有所差異，這就證明朱子此階段之言論仍多未定之論。所以縱使朱子曾有「敬貫動靜，以靜為本」一語，但到淳熙二年（乙未，年四十八歲）以後便不再有這種說法了。該長函還提到：

吾兄所舉答呂寺丞、孫敬甫書皆分清未發工夫、未發地界，未有主靜之意。……唯〈與湖南諸公書〉、〈答徐彥章〉書與〈已發未發說〉同湖南書自在己丑 湖南書附於六十四卷之末，亦疑朱子所自刪也，〈彥章〉書其時不可考，然多訛誤，不足據，亦必非戊戌、己亥後書也。³⁶

至於堪為「主靜」說之證據的〈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已發未發說〉〈答徐彥章〉書以及相關語錄等文獻，王懋竑則認為〈與湖南諸公書〉收在《文集》卷六十四之末，疑為朱子所不欲留存，而擬刪去者，就如同他在《文集》中剔除了部分中和舊說的文稿一般。而〈答徐彥章〉書，經由王懋竑的仔細考核，則不僅無法正確推斷其寫作時間（必定不是己亥朱子五十歲以後的晚期作

³³ 同前註，卷 11，〈王子答朱湘洵書〉，頁 20 下 -21 下。

³⁴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32，〈答張欽夫〉書十八（諸說例蒙印可），頁 1420-1421。

³⁵ 《太極圖說解·圖解》，收入《朱子全書》，第 13 冊，頁 71。

³⁶ 《白田草堂存稿》，卷 11，〈王子答朱湘洵書〉，頁 22 上 - 下。

品），且文字多有訛誤，故實不足以作為論據。³⁷

是以最終，可以作為朱澤澐「主靜」說的論據多為王懋竑所辯破，縱使有少數「以靜為本」的文獻材料，王懋竑也認為這是「中年未定之論」，故總結出「大抵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故專言靜則偏，不無流弊」³⁸一語來勸誡朱澤澐。

面對共學之摯友這般嚴厲地批駁，朱澤澐復造書一封為己說辯護，可惜完書後不久，他就溘然辭世了，更令人感到憾恨的是這篇信函並未見存於現有的《止泉先生文集》或《外集》中，反而在五年之後（乾隆元年，丙辰），王懋竑卻寫下一封萬言書來追答朱氏的這封絕筆信函，書中一開頭便言明此一情事：

嗚呼！此湘淘兄之絕筆也，其生平學問具見於此，而其所差誤亦在於此。……此書作於壬子五月八日，其時湘淘病已劇，而余亦病，故不及作答，而湘淘已卒於六月十九日矣。歷今五載，……復為申言之。湘淘自少閉門力學，不交接世俗，……專意探索，於靜中有得力處，其學問大指從《延平答問》中來，而於朱子《文集》、《語類》取其與己意合者，為疏通證明之，至於《文集》之龐雜、《語類》之訛誤，則未嘗以辨之也。其後更推極崇深，旁羅貫穿，以〈太極圖說〉、〈定性書〉、蒙、艮卦註、〈玉山講義〉為宗指，而據朱子「以靜為本」四字以定其

³⁷ 王懋竑曾就此書的文字考訂問題致書朱澤澐，云：「朱子〈答徐彥章〉書，其精確者自不可易，但中有訛誤，如『善中有動靜二者』，守字固誤，中字亦未為協，疑此有缺文。……疑是丁酉、戊戌間，劉令人卒後，非庚戌、辛亥間也。」見《白田草堂續稿》，卷3，〈與朱湘淘書〉書十四（朱子答徐彥章書），頁22上。案：《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4，〈答徐彥章書〉的時間考訂是朱、王兩人爭論的焦點之一，朱澤澐將它們繫於庚戌年（朱子年六十一歲），而王懋竑則認為當是五十歲以前之作。查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則將此諸函繫於紹熙二年辛亥（朱子年六十二歲），實於朱氏之說為近。見氏著：《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頁338。

³⁸ 《白田草堂存稿》，卷11，〈壬子答朱湘淘書〉，頁24下。

說，遂創為「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之論，於是湘洵之學自為一家，而與朱子垂世立教之指亦少異矣。余蓋不能無疑於此。³⁹

說明事由之後，王懋竑為朱澤澐的朱子學研究給出一個總評，他說：朱澤澐個人之學問大抵從《延平答問》而來，乃於靜處得力，故執持朱子一時所言「以靜為本」四字，並擷取朱子文獻中與己意相合者，創為「從主敬參透主敬消息」之說。職是之故，王懋竑認為這僅可說是朱澤澐個人「自建綱宗」的創獲心得，「非朱子教人之法也」。⁴⁰故王懋竑始終無法信服而必與之爭辯。

繼之，王懋竑此函便根據朱澤澐的來信細分為十二個段落，分別摘錄朱氏來函中的文字，詳加辨析。其議論態度與觀點之辯析，明顯錙銖必較。唐鑑（字栗生，號敬楷，又號鏡海，1778-1861）評此書函「自不免於破碎繚繞之病」，⁴¹筆者以為誠是如此，因細查諸辯語實不外前一書所云之種種反對意見的反覆申述。

不過，此函卻有兩點相當值得留意：第一是朱澤澐的原書函未獲留存，所幸可由王懋竑的答書中得窺見朱氏之最後論旨，蓋王懋竑再三說及「夫主敬窮理以透涵養未發，主靜立極之功，此是書中大指歸宿處。」⁴²又在此書後附有〈書重答朱湘洵書後〉一文，亦云：「湘洵此書，其宗旨在從居敬參透主靜消息，謂敬、靜有貫通之妙，而以主靜為極詣。」⁴³此一說法，雖遭王懋竑強烈質疑，他說：「遍考朱子《章句》、《集註》、《文集》、《語類》諸書，未

³⁹ 同前註，卷 12，〈重答朱湘洵書〉，頁 1 上-2 上。

⁴⁰ 同前註，頁 3 下。案：王懋竑於〈祭文〉中亦蓋棺論定的稱朱止泉的主「靜」說為一家之言，絕非朱子之意。彼言：「會通夫龜山門下相傳之指，而上溯於主靜立極之本原，此固兄之所自得，而饒仲元、何子恭以後抑未之聞也。」見《白田草堂存稿》，卷 17，〈祭朱湘洵文〉，頁 3 上。

⁴¹ 清·唐鑑：《清學案小識》（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卷 4，〈翼道學案·寶應王先生〉，頁 50 下。

⁴² 《白田草堂存稿》，卷 12，〈重答朱湘洵書〉，頁 25 下。

⁴³ 同前註，卷 12，〈書重答朱湘洵書後〉，頁 26 下。

嘗有一語及此者」，⁴⁴但由此語不難推想朱澤澐的觀點，意即他正是要由居敬窮理的工夫「以透未發之中」，體證「天理本然之靜，虛明不著一物」⁴⁵的未發心境。也就是說，朱澤澐的「主靜」說意在指示體證與保任未發之中的修養境界。

再者，相對於之前的〈王子答朱湘淘書〉，重在辯破朱澤澐「主靜」之論，此〈重答朱湘淘書〉則可看到王懋竑自身立論的觀點，其論點主要是以「主敬」來對比於朱澤澐的「主靜」，他認為朱子明言「敬貫動靜」，意指持敬的工夫無分於動、靜兩個時節，故「言主敬，不必更言主靜」，蓋「主敬已足該括主靜矣，又何必添說主靜乎？」⁴⁶且他更本此理解進一步地指出「『涵養須用敬』二語，此則朱子終身守之為定法。」⁴⁷這些論點後來明確地呈現在他著名的《朱子年譜》一書中，只是此時尚未明白指出朱子確立此宗旨的時間點。雖如此，亦可發覺「主敬」說的確立或許是這場論議對王懋竑之學術成就最大的正面刺激與助益。

又在此之後，王懋竑復有〈答朱宗洛書〉一函，當可一併參看，因為此書函為朱澤澐之子朱光進（宗洛）來信商討「主靜」之說的回覆信，由於經過之前的反覆論議，以及王懋竑居處長輩（師徒關係）的身分，故在此書中，他的論說益加直截而明白，例如他說：「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攪拏，非所以為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上安頭，是太極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⁴⁸更重要的是，王懋竑終於在此信件中明確地指出他所理解的一朱子終身不移的學問宗旨，他說：

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與林擇之書〉拈出程子「涵養須用

⁴⁴ 同前註，卷 12，〈重答朱湘淘書〉，頁 25 下 - 26 上。

⁴⁵ 同前註，頁 25 上。

⁴⁶ 同前註，頁 17 下 - 18 上。

⁴⁷ 同前註，頁 19 上。

⁴⁸ 同前註，卷 13，〈答朱宗洛書〉書一（前辱手書），頁 11 上 - 下。

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⁴⁹至此，王懋竑終於明白地指出朱子確立以程子的「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作為學問宗旨的確切時間點就在乾道六年（庚寅），朱子四十一歲的時候。這一說法後來也就成為其代表作《朱子年譜》的標誌性論點。

三、王懋竑《朱子年譜》持論之原委

透過上面的討論，可知王懋竑《朱子年譜》的持論是其來有自的，他堅稱朱子「己丑之悟」猶為未定之論，這個論點其實正是針對朱澤澐的《聖學考》一書中的「主靜」說而發。底下將再以王懋竑所作的《朱子年譜》（含《考異》與《論學切要語》）為材料更進一步說明這一點，以及相關的問題。

（一）《朱子年譜》中延續與朱澤澐論辯之軌跡

首先，在上文中已說明王懋竑由反對朱澤澐的「主靜」說，進而提出「主敬」的論點與之抗衡，更在晚出的〈答朱宗洛書〉中確立朱子於庚寅年（乾道六年，四十一歲）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後始確立學問宗旨，這一說法王懋竑在《年譜考異》與《論學切要語》中反覆地申明，例如：

庚寅，始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學問大指定於此。⁵⁰

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終身守之不易。⁵¹此論點之首要理據就在《年譜》卷一「乾道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條所錄〈答呂伯恭書〉與〈答劉子澄書〉兩函，⁵²因為此兩函俱標舉此二語為「入德之門，

⁴⁹ 同前註，頁12上-下。

⁵⁰ 《朱子年譜考異》，卷1，頁297。

⁵¹ 《朱子論學切要語》，《朱熹年譜》，卷1，頁432。

⁵² 《朱子年譜》，卷1，頁48。案：此兩函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呂伯恭書〉四（竊承進學之意），頁1425-1427；與卷35，〈答劉子澄書〉二（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為憂），頁1533-1535。

無踰於此」，是「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者。所以，王懋竑更在《年譜考異》中論證：

按自庚寅與呂東萊、劉子澄書，拈出程子兩語，生平學問大指蓋定於此，……至甲寅〈與孫敬甫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尤為直截分明。蓋相距二十五年矣，而其言無毫髮異也。自庚寅以後，書問往來，雖因人說法，間有所獨重，而其大指不出此兩語。晚年為〈鄂州稽古閣記〉、〈福州經史閣記〉，正以此兩語相對發明，其指意尤曉然矣。《通辨》、《正學考》皆不載此二書，今據《文集》補入。⁵³

王懋竑的論證方式是說明朱子不僅在四十一歲時揭示此二語作為學問宗旨，且直至紹熙五年（甲寅）六十五歲時致書孫敬甫⁵⁴也同樣是這個主張，於是可以證明此二語當是朱子持守終身的學問要旨，即使這些年間的書問往來，或因人說法，因病予藥，而有倚重之不同，然則朱子的學問宗旨實不出此二語。又在此前後寫作之〈鄂州州學稽古閣記〉與〈福州州學經史閣記〉兩文亦可作為佐證。

此處需補充說明，據〈年譜·例義〉所載：「先生友朋講論，凡有採取，必明其所自。同邑朱澤澐著《聖學考略》，先生改曰『正學考』，所論屢及之。」也就是說，在《朱子年譜》等相關著作中，王懋竑對於朱澤澐的《朱子聖學考略》一書俱稱呼為「正學考」，因而可知上段引文王懋竑特別慨歎「《正學考》皆不載此二書」，正是針對朱澤澐而發。

又因為朱澤澐主張朱子己丑之悟所得的「中和新說」為朱子的學說宗旨，並由此創發「以靜為本」之見解，這是朱澤澐「主靜」說的立論主軸。在上面的討論中，已經說明王懋竑不認同這個觀點，因而與他展開「主靜／主敬」的

⁵³ 《朱子年譜考異》，卷1，頁320。

⁵⁴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3，〈答孫敬甫〉書一（未及識面），頁3061。

論辯，王懋竑的反對意見也在《年譜》中明確的呈現，細言之，相關的論述可分成兩個方面：一是申述「不可執己丑一悟以為定也」，⁵⁵二是王懋竑徑視中和新說為回歸李延平「體認未發氣象」之論，故論證朱子晚年對延平多有微詞，已不再主張此說矣。

關於己丑之悟猶多未定之論的論點，王懋竑有以下的說法：

按〈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皆在己丑之春，蓋作易舊說，猶多未定之論。……〈與張欽夫〉「諸說例蒙印可」一書，當在〈與湖南諸公書〉之後，亦己丑答也，其中亦多未定之論。如「以心為主」，即「心體流行」之見。又云「仁者心之道，而敬者心之貞也」，後來都無此語。……又云「以靜為本」，亦似偏於靜。……凡此恐皆未定之論。⁵⁶

王懋竑對〈已發未發說〉以及〈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兩文的反對意見，在〈王子答朱湘洵書〉中已有過表示，這部分在《年譜考異》中大抵不變，只是說得更加詳細。至於代表己丑之悟的〈答張欽夫（諸說例蒙印可）〉書，王懋竑則不憚其煩地指出七個要點，說明書中之論仍屬未定之論，實不足以作為朱子的學說宗旨。在上面論證朱子在庚寅（四十一歲）方確立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為學問宗旨，且終身穩立不移，是運用文獻繫年的舉證方式，至於此處對己丑之悟為未定之論的質疑，則是採用文義辨析的方法。當然，王懋竑的這個論點，是很有問題的，然何以如此說呢？根本原因在於他誤解了朱澤澐的「主靜」說，以及面對「朱陸異同」問題的忌諱心理所致。前者如在〈答朱宗洛書〉中，王懋竑已有言：「動靜則以時節言，如人閉戶獨坐，默然無思，此靜也。……若以靜為主，必屏絕念慮，坐禪入定。」⁵⁷可見他將朱澤澐的「主靜」說理解成冥思靜坐的禪學修煉法門。至於後者，則如在上段

⁵⁵ 《朱子年譜考異》，卷2，頁331。

⁵⁶ 同前註，卷1，頁311-312。

⁵⁷ 《白田草堂存稿》，卷13，〈答朱宗洛書〉書一（前辱手書），頁15上。

引文之後，王懋竑續言：「如云『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湛之學似之。又云『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自然發見昭著，不待別求』，陽明之學似之。是皆早年未定之論，而後來所不取也。」⁵⁸ 這是將「主靜」說等同於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稱白沙先生，1428-1500）、湛若水（字民澤；改名雨，後定名若水，字元明，號甘泉，1466-1560）與王守仁（字伯安，號文成、陽明，1472-1529）之學，言外之意，即是有淪為禪學之弊。因為王懋竑對朱澤澐的「主靜」說有這般錯誤的聯想（視為等同延平「默坐澄心」以體認未發氣象的教法，亦是墮入陸王心學、禪學的弊病），所以他要詳加辨明朱子「逮庚寅，拈出『涵養須用敬』兩語，已不主延平。」⁵⁹ 彼云：

迨己丑，又悟其非，更定已發、未發之分，以胡氏先察識後涵養為不然，而於未發仍守延平之說。其云「以靜為本」，又云「從靜中漸漸養出端倪來」，則猶體認未發氣象之論也。……癸巳以後，往來講論亦不及延平。至甲辰〈與呂士瞻〉書、戊申〈與方賓王〉書，明言程子之說不可移易，延平自是一時入處，未免合有商量。晚年語錄，楊道夫、葉味道、陳安卿、廖子晦所記尤詳。《中庸或問》力辯呂氏求中之非，而謂龜山亦未免呂氏之失。龜山之說，則延平之所自出也，此其前後異同之故，亦大略可考矣。⁶⁰

王懋竑詳考朱子對李延平學說的態度與評議觀點，指出乾道九年（癸巳，四十四歲）以後的論議已少有涉及延平，而在淳熙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的書信，乃至晚年語錄、《中庸或問》等皆堅守程子之說，而對延平之教多有非議。王懋竑此一考證工作是有價值的，能說明朱子對延平之教的游移情況，以及對二程之學的態度，但是他將朱子的中和新說、朱澤澐的「主靜」說直接等同於李延平的教法，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⁵⁸ 《朱子年譜考異》，卷1，頁312。

⁵⁹ 同前註，卷3，頁377。

⁶⁰ 同前註，卷1，頁297-298。

（二）回應朱子學問次第進程說

王懋竑撰作《朱子年譜》，除了在朱子四十歲、四十一歲詳加考辨其學問宗旨的確立時間外，他對於朱澤澐所提出的朱子為學次第說，亦多有關切，蓋朱澤澐認為朱子的學思發展歷程並非止步於己丑年「中和新說」之悟，而是經過修養工夫的層層深化，因此，朱子在五十七歲時將所有工夫統歸於「敬」，達至「動靜合一」的境界，復於六十一歲體證到「心理貫通」的高妙理境，故在庚戌年便有「方理會得恁地」、「見得分明」之語。但如同前面所言，王懋竑認為朱子從庚寅年（四十一歲）確定以二程「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為宗旨，便終身守之不易，故對於朱澤澐所提出的朱子學問進程說，自是無法苟同，他說：

按此所云：「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此為恭叔言，欲其向裏著實用功，所謂因人說法，應病與藥者，非向來先後緩急，果有倒置處也。其下云：「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其意可見也。鄒譜僅載前段，而合之〈與子澄書〉，則似朱子至丙午方自悔者。《正學考》以「丙申至丙午，十二年為一大關鍵，至此，主敬工夫益親切。」皆是誤認，不可不辨也。⁶¹

朱澤澐《聖學考》卷六錄〈答潘恭叔〉第八書，⁶²並附註一案語：「丙申與季通先生講論，專意涵養而不輟講學之功，以益其栽培。又歷十二年至丙午，主敬親切，動靜合一，是又一大關。」⁶³而鄒瑑其《年譜正訛》則取〈答潘恭叔〉第五書的前段文字，並輔以〈與呂子澄〉書，顯示朱子此時「今方自悔耳」。然王懋竑俱不能同意，所以，他特別透過文義解析的方式反駁這兩種說法，他解釋此段文字乃針砭、勸戒潘氏之語，此可由「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

⁶¹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1，頁431。

⁶²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0，〈答潘恭叔〉書八（敬之一字），頁2313。

⁶³ 《聖學考》，卷6，頁21上。

太高與太多耳」一語看出來，故強調丙午（五十七歲）又是學思遞進的一大關鍵之說法實是一種錯誤的認識。

同理，關於朱澤澐強調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又是朱子學思演變之一大關鍵的說法，亦為王懋竑所反對，他說：

《語錄》有云：「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始無疑。」又曰：「自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隔一膜。」此聖賢日新不已，望道未見之心。若遂據以為證，是又痴人前不得說夢也。《文集》、《語錄》中多謙己誨人之辭，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間或有為而發，如〈與象山書〉：「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此因象山譏其「支離」，故云爾。不可泥看。……此又讀《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

故因《年譜》語而附論之，世之君子，望有以定其是非焉。⁶⁴

同樣透過文義解析的方式，王懋竑認為這些話語不可執實來看，因為其中多有自我謙抑，以求誨人之辭，又或者是剋就言說的對象與情境而有特殊的針對性，因此，不宜拘泥於語言文字之中。且這樣的說法，就如同孔子自陳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一般，是日新不已，求道甚篤而若未見之意，故「非是六十歲前錯用工夫，到此方悔悟也。」⁶⁵

關於朱子的學思歷程問題，除了辨析朱澤澐之說的錯誤外，值得補充說明的是，王懋竑特別在意的是「果齋李氏又謂『晚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尤甚，後來異論皆自於此也」⁶⁶之說。案李方子（字公晦，號果齋，1169-1226）為朱子門人，嘗著《紫陽年譜》三卷，為《朱子年譜》之作的篙矢，惜屢經編修刊印，其元本已不可見，⁶⁷但

⁶⁴ 《朱子年譜考異》，卷1，頁298-299。

⁶⁵ 同前註，卷4，頁383。

⁶⁶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2，頁455。

⁶⁷ 王懋竑明白地表示：「李果齋元本不可見」，見《朱子年譜考異》，卷1，頁288；《白田草堂存稿》，卷8，〈記朱子年譜正訛後〉，頁6下。

其觀點著實流傳甚廣，⁶⁸ 朱澤澐、王懋竑等人皆知曉其說，⁶⁹ 王懋竑甚至認為歷來朱子學詮釋史上的種種朱子「晚年定論」的錯誤論述皆肇始於此一謬說，故他對此說的立論根據亦詳加反省一番：

按果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陽明《晚年定論》之作，朱門久自開之矣！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豈不信哉！⁷⁰

王懋竑指出果齋之說的理據不外《文集》卷七十四的〈玉山講義〉、卷五十八的〈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以及卷六十一〈答林德久〉等三篇文章，⁷¹ 但仔細檢核這些文本的內容，可以發現它們討論、發揮的只是性善之說，而非真另指示一超越、高懸的本體，要人加以契悟、把捉之意。這個偏失朱子本意的誤讀情況正說明了不需等待王陽明高舉朱子「晚年定論」的大纛，在夫子門牆內已有乖違其說的憾事發生，正如《大學或問》中朱子直言：「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一樣。然而若真要勉強論述一朱子「晚年定論」，王懋竑則指出朱子明確批駁「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合下便要體察、執持的〈答廖子晦〉書，差可論列，故有言：「廖書在庚申正、二月間，此真所謂『晚年定論』者。」⁷²

⁶⁸ 案：李方子《紫陽年譜》（原本）已散佚不可見，近人束景南從真德秀《西山讀書記》卷三十一與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二，輯得大部分內容，兩書中確有「晚見學者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的文字，見氏著：《朱熹年譜長編（增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附錄〉，頁1522-1523、1553-1554。

⁶⁹ 朱澤澐對李果齋「晚年指示本體」說的討論，見《聖學考》，卷9，頁34上-下。

⁷⁰ 《朱子年譜考異》，卷4，頁399。

⁷¹ 案：王懋竑在《朱子論學切要語》中則有另一說法，他引《文集》卷五十二〈答吳伯豐〉書云：「果齋李氏所論，似本此書。」《朱子論學切要語》卷2，頁452。然《論學切要語》為未定稿，故上文以《年譜考異》為主，僅誌於此以存其說。

⁷²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2，頁479。

雖如上述所論，王懋竑對朱澤澐之論點多有非難之處，但這不表示王懋竑全盤推翻其好友朱澤澐的朱子學研究心得，實則在寫作《朱子年譜》的關鍵處——「朱陸異同」論一問題上，他大大得益於朱澤澐的獨到見解。

例如，在淳熙二年乙未（A.D. 1175），經由呂祖謙（字伯恭，稱東萊先生，1137-1181）的促成，代表理學與心學的兩位思想家朱子與陸象山進行了第一次的會面論學，史稱「鵝湖之會」。關於此會，王懋竑在《年譜考異》中言：

按鵝湖之會，《年譜》不詳，《語錄》無及此者。《象山年譜》、《語錄》所載最悉，朱陸異同皆見於此，故附著之。……按鵝湖之會、朱陸異同是作譜大關鍵，果齋元本不可得見，李為陽明後人，於此皆諱而不言，故載《文集》諸書并張、呂書，俾後人有考焉。⁷³

關於鵝湖之會的記錄，往昔的《年譜》語焉不詳，《朱子語類》亦少有存載。反而在《象山年譜》與《象山語類》中則記載悉備。可是，王懋竑認為實在說來鵝湖之會、朱陸異同兩大爭議問題正是《朱子年譜》纂作的重大關鍵，因此，他選擇在《朱子年譜》的正文「淳熙二年乙未」條下，打破常例地摘錄非譜主的文獻（《象山年譜》與《語類》），並且輔以〈答張南軒〉書以及《東萊集》、《南軒集》等材料，期望能呈現該次面會之實情。

既然「朱陸異同」是作譜之大關鍵，於是王懋竑又在《年譜考異》「淳熙八年辛丑，五十二歲。二月，陸子靜來訪」條下，詳註云：

按陸氏之學，與朱子合下不同，故朱子於未相識時，即斷其為禪學。鵝湖之會，議論不合，……故雖不合，而常有招徠勸誘之意，蓋於陸氏兄弟惓惓有深望焉。……至甲辰，因曹立之表，遂與朱子忤，然輪對五劄，朱子與書，明謂其自蕙嶺帶來，……戊申，遂有無極、太極之辨，詆訾不遺餘力，判然與朱子為敵矣。朱子誦言攻之，亦在乙巳、丙午以後，知其必不可以合也。⁷⁴

⁷³ 《朱子年譜考異》，卷2，頁330。

⁷⁴ 同前註，卷2，頁351。

正如王懋竑所自稱的：「弟生平唯以考訂異同，解釋文義為事」，⁷⁵在前面的例證中，王氏詳於文義的辨析；而在此處，他便表現出透過舉證文獻的實證方法，詳細考核朱、陸兩人的互動關係，並說明朱、陸兩家之學「合下不同」，「必不可以合」。

此主張的提出看似輕而易舉，然而面對積累三百餘年林林總總的論述陳說，要能入乎其中（精準地掌握問題的關鍵）又可出乎其外（避免陷入我是彼非的獨斷評判）地通盤解決與回應，其實並不容易，所以王懋竑除了堅持運用文獻考訂繫年與文義辨析的處理方法外，他對於歷來諸說的評議，很大的程度上是藉賴朱澤澐的《朱子聖學考略》一書，例如他說：

程氏《閑關錄》、陳氏《學蔀通辨》皆辨朱、陸異同之說，為有功於吾道者。程氏說得其大概，而間有誤處。陳氏說極為詳盡，而始同終異，中年疑信相半之說，則亦有未然者，今不暇悉論也。吾友朱湘濤辨陳說極詳，見所著《正學考》中。⁷⁶

王懋竑對於程瞳（字啟曠，號莪山，生卒年不詳）的《閑關錄》與陳建（字廷肇，號清瀾，1497-1567）的《學蔀通辨》這兩部站在朱子學立場回應「朱陸異同」論的代表性作品均有不滿，但其《朱子年譜》之作，依其體例，乃是以文獻繫年，行誼考核為主，故無暇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通盤地評析與討論，所以他特別指陳凡此相關問題，均可參看其好友朱澤澐的《朱子聖學考略》一書。這就反應出王懋竑雖然對於朱澤澐《朱子聖學考略》書中的朱子學問歷程之觀點持不同的意見，但他對於朱氏能對歷來「朱陸異同」論諸說的詳加考辨，仍是極為推崇的。

綜上所述，應已說明了王懋竑《朱子年譜》中關於朱子學思確立於四十一歲，而已丑年中和新說之悟「猶是未定之論」的立論原委，實與朱澤澐的《朱子聖學考略》一書所提出的朱子學思歷程階段說以及強調「以靜為主」的獨特朱子學詮釋觀點關係密切。

不過，在前面的討論中，最後涉及了「朱陸異同」論的問題，前文曾提

⁷⁵ 《白田草堂存稿》，卷11，〈王子答朱湘濤書〉，頁25上。

⁷⁶ 《朱子年譜考異》，卷2，頁352。

到朱澤澐的《朱子聖學考略》一書的撰作目的與學術貢獻之一就在於糾正歷來「朱陸異同」論的種種錯謬，因而獲得王懋竑的推許。然而回顧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之作，這般編年體的傳記體裁著作何以會說「朱陸異同是作譜大關鍵」⁷⁷呢？因此，考察「朱陸異同」論在明、清儒學史中的發展脈絡，當有其必要，亦即透過這個學術史的梳理，將有助於了解康熙、雍正年間《朱子聖學考略》、《朱子年譜》這兩部朱子學著作背後所處時代的學術思潮。

四、朱子學思發展階段論的歷史考察

「朱陸異同」論一議題在明代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推出後，發展到了高峰。蓋陽明於正德九年、十年之際，⁷⁸因己所倡新說與傳統主流朱子學說歧異，逐漸感到崇朱學者的輿論壓力與反彈，⁷⁹不得不對「朱陸異同」問題有所回應，「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小冊，名曰『朱子晚年定論』」。⁸⁰然其說一出，迅速在學術圈中引發喧然大波，站在反對、批判的

⁷⁷ 《朱子年譜考異》，卷2，頁330。案：美籍學者艾爾曼便以王懋竑的《朱子年譜》為例，說明十七至十八世紀考據學的方法對於宋學產生重大的衝擊，以致清代的學者紛紛透過年譜的編纂，利用傳記的形式為其譜主辯護。見（美）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pp. 197-198。

⁷⁸ 案：錢德洪所編《陽明先生年譜》將「刻《朱子晚年定論》」繫於正德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而此處繫年則參考束景南的考證修訂，見氏著：《王陽明年譜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746、806-813、855-863。

⁷⁹ 陽明說：「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誤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解紛耳。」見明·王守仁著，錢明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冊，卷4，〈與安之〉，頁186。可見其主觀動機在回應外界對其學說的抨擊，即藉此書來表明自己與朱子（晚年之說）並無不同，換言之，其寫作目的不專在「朱陸異同」之辨（或論證朱陸同調）一學術問題。以下凡本文引述陽明語，俱從此新編全集本，不再標註版本。

⁸⁰ 《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5冊，卷44，〈與汪仁峰書（二）〉，頁1791。

一方，當時便有汪循（字進之，號仁峰，又號京兆，1452-1519）、⁸¹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1465-1547）、魏校（字子才，號莊渠，1483-1543）、余祐（字子積，號訢齋，1465-1528）與顧璘（字華玉，號東橋，1476-1545）⁸²等人，他們紛紛提出質疑，並且明白指出陽明引據失考之處，例如羅整菴即表示《晚年定論》中所錄存〈答何叔京〉四函，實作於朱子四十六歲之時（因何氏卒於淳熙乙未年），且在兩年後，朱子始完成《論孟集註》與《或問》的編撰。後者被陽明判為中年未定之說，卻稱前兩年寫就的〈答何叔京〉四函是朱子晚年之作，顯然「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⁸³

值得注意的是，陽明的說法，雖然存在引據失考（時間不合）的破綻，但也確實激發了學者們對何為朱子「晚年定論」的思考與朱子學思歷程演變的議題探索。⁸⁴

（一）魏校：文公論心學凡三變

例如在當時，魏校不僅認為《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己意，即收載之」，且他在這封〈與余子積〉的信函中，更充分表達他對朱子學思歷程的看法與其最終定見的觀點，他說：

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為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

⁸¹ 錢明指出：汪循的反對代表新安理學集團對陽明學說之擴散的全力阻擊，而陽明編纂《朱子晚年定論》只是當時為了緩解輿論壓力的權宜之計。參見氏著：《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十六章，〈王學之遭遇——徽學考〉，頁421-441。

⁸² 案：顧東橋的質疑見《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1冊，卷2，〈傳習錄中〉，頁49。

⁸³ 明·羅欽順著，閻韜點校：《困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與王陽明書〉，頁144。

⁸⁴ 楊正顯述解夏尚樸（字敦夫，號東巖，1466-1538）對當時朱陸問題之爭論的情況描述時，便曾提及這點。見氏著：《覺世之道：王陽明良知說的形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95-96。

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峰之學，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功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⁸⁵

這段話申述朱子之學思歷程曾經歷過三次重大的轉折，從少年時期的學禪階段，到拜見李延平，因而歸返儒門，是第一變；繼之，結識張南軒，得聞胡宏（字仁仲，稱五峰先生，1105-1161）之說，初悟《中庸》「中和」之論，以動（已發）時省察（察識端倪）為工夫下手處，這是第二次的轉變；爾後，復警覺此一修養「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於是，又有第三次的悔悟，轉而強調當於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且「動靜交致其力，功夫方得渾全」。如是，方為朱子的最終定見。

魏校的說法，大抵是以中和新舊說為核心，第二變指的是中和舊說，第三變則屬中和新說，可見當時學者對朱子參悟中和一問題已有所掌握。至於第一變則猶有可議之處，然已碰觸到朱子早年習禪與何時拜李延平為師，這一代表朱子逃佛歸儒之時間點的關鍵問題。⁸⁶

⁸⁵ 明·魏校：《莊渠遺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與余子積〉，頁33上-下。案：這段話往往被誤認為是徐祐（字子績）的觀點，如被收錄在黃宗羲（字太沖，號南雷，稱梨洲先生，1610-1695）所編《明儒學案》卷3，〈崇仁學案 三〉「侍郎余訥齋先生祐」的小傳以及《明史》卷282的〈余祐傳〉中，然而實際上，應該是魏莊渠的論點。

⁸⁶ 案：關於朱子何時從學於李延平（代表朱子回歸儒學認同），歷來有多種說法，蓋朱子曾三度至延平親訪李侗，分別在癸酉（24歲）、戊寅（29歲）與庚辰（31歲）。早先版本的《朱子年譜》認為癸酉年間初見延平，便拜入延平門下，如李默本、洪去蕪本《年譜》；而王懋竑則考訂朱子當於庚辰年始盡棄異學，受教於先生。見《朱熹年譜》，頁17，以及《年譜考異》，卷1，頁292-293；至於東景南的《朱熹年譜長編（增訂本）》則一反前說，主張當以《延平答問》一書的首封書信為據，認為朱子於紹興二十七年丁丑（28歲）方是徹底信從李延平之教的時刻，詳見該書頁225-226。

這般透過朱子學思歷程的探討，來具體回應「朱陸異同」問題的處理方式，並非孤例，實際上，在明清學術思想史上儼然成為一股朱子學詮釋史的潮流。

（二）高攀龍：朱子所見歷三轉而始定

再如明代晚期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忠憲，1562-1626）對朱子學思歷程的論述也同樣扣緊中和新、舊說一議題而發，他說：

朱子初年之見，蓋認性為未發，心為已發，凡謂之心則無未發之時，而未發之性存焉，則終未嘗發也。故其工夫亦只在察識端倪，而却於程子所謂涵養於未發之前者有疑。蓋全向流行發用處尋求也，後來却見得渾然全體之在我，存者存此，養者養此，非別有未發者限於一時，拘於一處，然其樞在我，非如向日在萬起萬滅，方往方來之中立腳矣。後又益見得性情之妙管攝於心，而動靜之功貫徹於敬，當其未發，仁義禮智之性具焉，此心寂然不動之本體也；及其已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形焉，此心感而遂通之妙用也。而戒慎恐懼之功則周流貫徹於動靜之間，而尤必以涵養為省察之本，此所以未發則鏡明水止，而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不中節也。凡朱子所見大約歷三轉而始定。⁸⁷

高攀龍同樣主張朱子的成學歷程經歷過三次的轉折：首先是從延平的「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到認「性為未發，心為已發」，而工夫只在察識端倪；此時只知在萬起萬滅、方往方來的意念活動處用功，後來方見得所謂「未發」者絕非限於一時、拘於一處，凡已發之中便有未發之體存焉，因此，工夫雖從已發處下手，但必透徹至未發之性體方為得力，這是第二次的轉折。此後，又有第三次的轉折，這次是對未發、已發有了新的界說，不再以心、性兩者分屬之，改以心統貫、管攝性、情二者，且無論動、靜兩時皆可以持敬戒懼之工夫照應之，惟必以靜時的涵養為動時的省察之根本。至此，方為朱子最後之定見。

⁸⁷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8上，〈與顧涇凡論已發未發〉，頁18上-19上。

高攀龍的論述相較於魏校之說，對於中和議題之參悟過程中，朱子的心性論觀點之細微轉變有更清楚的掌握，是以他對朱子學思轉折的闡述更為精緻。然上述兩說都僅是在單篇書信往來中表達自己對朱子的學思歷程之理解，至順治十八年辛丑（1661年）秦雲爽（字開地，號定叟，生卒年不詳）撰作《紫陽大指》一書，才開始有針對此課題的學術專著出現。⁸⁸

（三）秦雲爽：平生得力止在中和之旨

《紫陽大指》⁸⁹全書共計八卷，卷一為朱子初學，卷二論已發未發，卷三論涵養本原，卷四論居敬窮理，卷五論致知格物，卷六論性，卷七論心，卷八論太極。每卷收錄朱子相關主題書函若干，間綴以簡短的按語說明編輯之意。其主要觀點在該書〈目錄〉中有清楚的表述，試看下列三條：

卷一 朱子初學 朱子初年原自有未定之論，由此而讀全集，可次第識也。

卷二 論已發未發 此是千聖真脈，朱子一生學力大關，特詳錄。

卷八 論太極 朱子平生得力止在中和之旨，錄此亦見先覺一貫大概云。

秦雲爽部分接受陽明所言，他認為朱子早年確實存在未定之論，不過在中年（乾道三年，朱子年四十歲）參悟已發未發之旨以後，便確立終生的學問宗旨，不再有所改易，故此中和問題的領會，實是「朱子一生學力大關」。

又細言之，當說「先生于已發未發之論，蓋三變而後定」⁹⁰也。因此，他錄引〈答何叔京〉三書⁹¹後，下一按語言：「愚按此三書實先生一轉關處

⁸⁸ 案：據該書〈凡例〉，此書成於順治十八年辛丑（1661年），卻遲至二十一年後（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年）始得梓行。

⁸⁹ 清·秦雲爽：《紫陽大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5年，景印紅格抄本），子部·第22冊。

⁹⁰ 同前註，卷1，頁12上。

⁹¹ 案：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0，〈答何叔京〉書二（熹孤陋如昨）、〈答何叔京〉書四（專人賜教）與〈答何叔京〉書十一（奉親遣日如昔），頁1801-1802、1804-1805、1821-1822。

也」，⁹²表示於延平卒後，朱子方自悟得中和舊說。接著，卷二開篇引《文集》卷四十三〈答林擇之〉⁹³書說：「此先生大轉關處也」，⁹⁴代表朱子中和新說之領悟，又錄〈答張欽夫〉兩函⁹⁵後，強調「此二書與〈答林擇之〉書略同，但更暢達耳，先生之學於是始大定。自後議論蓋無不本于此云。」⁹⁶

上述之說，猶近於魏校、高攀龍兩人之論，仍是在扣緊中和問題為朱子學問發展的關鍵，除此之外，秦雲爽又在卷四錄存〈答呂伯恭〉⁹⁷一書正式回應何為朱子「晚年定論」的問題，蓋該信函中朱子言：「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秦雲爽於該文末下一按語云：

愚按先生一生所以自治治人者，實盡此兩言。至說「說敬字處尤多」，又因「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語，此真先生晚年定論也。

愚反復先生之書，錄其論兩言之最親切警省有裨學者如左。⁹⁸

可見秦氏認為當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一語作為朱子最終的晚年定論。

（四）陸隴其：再定於退求句讀文義之後

有趣的是清初朱子學名家陸隴其（字稼書，稱當湖先生、平湖先生，1630-1693）在得覽秦雲爽所作《紫陽大指》一書後，甚為不滿，因此，針對秦氏「兩轉關」的說法，他提出自己的見解：

⁹² 《紫陽大指》，卷1，頁8下。

⁹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3，〈答林擇之〉書六（所答二公問），頁1967。

⁹⁴ 《紫陽大指》，卷2，頁1下。

⁹⁵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2，〈答張敬夫〉書二（誨諭曲折數條），頁1392；〈答張欽夫〉書十八（諸說例蒙印可），頁1418-1421。

⁹⁶ 《紫陽大指》，卷2，頁5上。

⁹⁷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呂伯恭〉書四（竊承進學之意甚篤），頁1425。

⁹⁸ 《紫陽大指》，卷4，頁1下。

然考《紫陽大指》中載〈答何叔京〉三書而評之曰：「此三書實先生一轉關處也。」則猶似未脫陽明之窠臼者。嘗合朱子一生學問前後不同之故考之，朱子之學傳自延平，延平教人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矣，教人反覆推尋以究斯理矣。朱子四十以前出入佛老，雖受學延平，尚未能盡尊所聞，是以有中和舊說、有〈答何叔京〉諸書，與延平之學不免矛盾。及延平既沒，朱子四十以後始追憶其言而服膺之，〈答林擇之書〉所謂「辜負此翁」者，則悟中和舊說之非，而服膺其未發氣象之言，此朱子之轉關也。〈答薛士龍〉書所謂「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是以答叔京諸書為悔，而服膺其反覆推尋以究斯理之言，此又朱子之一轉關也。是朱子之學一定於悟未發之中，之後再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之後。⁹⁹

陸隴其認為秦氏之說過度強調已發未發的心性體驗，終難脫陽明「晚年定論」之說的窠臼。而他的論點旨在點出朱子的成學過程就是對其師李延平之教誨的回歸，蓋延平曾教導朱子——「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與「反覆推尋以究斯理」——這兩種修養要領，然而朱子四十歲以前始終耽溺於佛老之學，縱使已受學於延平，卻未能全然服膺延平之教。故待延平過世以後，朱子四十歲時深感「辜負此翁」，復重新尋討延平之教誨，因而對於求未發時氣象有新的領會，所以有中和新說之悟，這是第一道轉關。繼之，朱子又有「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¹⁰⁰的反省語，可見朱子又從單就心性用功轉向讀書明理，注重句讀文義之學，此是第二道轉關。故概言之，朱子之學「一定於悟未發之中」，「再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之後」。

除此之外，陸隴其還撰有《讀朱隨筆》一書，該書的體例不同於《紫陽大指》之採主題式的選輯朱子文獻，以說明朱子學思歷程一課題，而是通盤地自

⁹⁹ 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答秦定叟書〉，頁24上-25上。

¹⁰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8，〈答薛士龍〉書一（熹竊伏窮山），頁1696。

《朱子大全集》卷三十至卷一百以及《別集》八卷中節錄朱子文獻，以為一選編讀本，其選材範圍雖不限於「朱陸異同」問題，但此問題意識實為其文獻編輯的首要指導綱領。其要者，如節錄〈答張敬夫〉¹⁰¹書後云：「愚按此書註云『壬辰冬』，而〈中和舊說序〉在壬辰八月，則此書固朱子定論也。」¹⁰²再如徵引另一〈答張欽夫〉¹⁰³書，言：「通一書大抵言心有動靜，而非復如中和舊說矣。此與〈答湖南諸公一書〉意同，其為朱子定論無疑。」¹⁰⁴此處可留意，陸隴其認為朱子對中和問題的徹底解決要推遲到壬辰（乾道八年，A.D. 1172）朱子四十三歲時。其次，對於朱陸「晚同」的論點，他則透過〈鄂州州學稽古閣記〉¹⁰⁵後的按語：「此一篇足破六經皆我註腳之言，此是癸丑年作，又可見其晚年之論矣」，¹⁰⁶傳達朱子晚年對為學讀書工夫的講求，故不可能混同於象山之論。猶有進者，他更引述〈答李季章〉書有「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¹⁰⁷之語，說：「其書末自言明歲已七十，則知朱子於晚歲乃倦倦於漢儒之學。如此，姚江之晚年定論豈不誣哉！」¹⁰⁸這不僅辯駁了陽明的「晚年定論」之說，更呼應了他提出的朱子晚年之學「再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之後」的主張。

在上面的討論中，可以看到諸位儒者對於「朱陸異同」問題所引發的朱子學思歷程之討論，大致上都採取舉證文獻的方式來進行討論，於是更進一步值得省思的問題則是諸說之理據的可信度問題，這便關係到文獻考訂與繫年的工作。

¹⁰¹ 同前註，卷 31，〈答張敬夫〉書十（答晦叔書），頁 1341。

¹⁰² 清·陸隴其：《讀朱隨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頁 6 上。

¹⁰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32，〈答張欽夫〉書十八（諸說例蒙印可），頁 1420。

¹⁰⁴ 《讀朱隨筆》，卷 1，頁 18 下。

¹⁰⁵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80，〈鄂州州學稽古閣記〉，頁 3800-3801。

¹⁰⁶ 《讀朱隨筆》，卷 4，頁 31 下。

¹⁰⁷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38，〈答李季章〉書四（熹今歲益衰），頁 1709。

¹⁰⁸ 《讀朱隨筆》，卷 1，頁 42 下。

（五）童能靈：《朱子為學次第考》

在陸隴其之後，又有童能靈（字龍儔，晚號寒泉，1683-1745）的《朱子為學次第考》與朱澤澐的《朱子聖學考略》這兩部著作，饒富趣味的是，這兩部書不約而同地都以考證之「考」字為名，且其體例均採年譜「繫年」之編排方式，即依朱子之年歲為次序，逐年輯錄重要的文獻材料，並隨文加上案語，以提示要點。此處當繼之說明童能靈的《朱子為學次第考》。

在釐清上述諸儒的各種論說後，童氏的論點實不難理解。首先，他認為：「朱子早晚之分只在心與理之辨」。¹⁰⁹此說何謂也？童能靈解釋道：《延平答問》中所錄「戊午書中所謂『天理流動之機』，於一機字內見此理也，此便是心與理不分明處。學者讀朱子文集，正須於此等處辨其為早年之說耳。」¹¹⁰又依照「性即理」的觀點言，「心與理之辨」也可說為心與性之間的嚴格畛域劃分，¹¹¹依此原則，童氏於《朱子為學次第考》的「己丑・四十歲」條下云：

春，始易中和舊說

能靈謹按：此為朱子進學大節目，故謹書之。然實據朱子所自作〈中和舊說序〉也，其序作於後三年壬辰，而實追論是歲己丑之學，故載於是歲之下，但其間亦特未發、已發條理初分耳。若夫心性之辨，則猶在壬辰、癸巳之間云。¹¹²

童能靈認為朱子四十歲的中和新說之悟，為「始分未發、已發條理」¹¹³的關鍵時刻，此時「雖已變舊說，而仍有未盡處，殆至癸巳以後，其說始為無

¹⁰⁹ 清·童能靈：《朱子為學次第考》（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景印清乾隆間刻本），卷1，頁26下。

¹¹⁰ 同前註，卷2，頁9上。

¹¹¹ 案：童能靈曾仿「理氣不離不雜」的論點，說明心與理的關係為「理不離乎心，而亦不雜乎心」。見前註，卷1，頁36下-37上。

¹¹² 同前註，卷2，頁29下。

¹¹³ 同前註，頁32上。

病」，¹¹⁴也就是說，這時候朱子的諸多說法（書信往來之記錄）「僅為初分未發、已發條理之言，而心性之辨蓋猶有待也」。¹¹⁵所以，要等到壬辰（乾道八年，A.D. 1172，朱子四十三歲）完成〈西銘解〉、癸巳（乾道九年，A.D. 1173，四十四歲）寫就《太極圖說解》、《通書注》，¹¹⁶才代表朱子學問的真正圓熟。所以他強調：「論朱子之學者，當以壬辰、癸巳以後之說為斷，為終身定論也。讀朱子之書者，亦自當以不合於〈西銘〉、《太極》、《通書》之說者，斷為早年之論，明矣。」也進而批評陳建的《學部通辨》以及陸隴其的論點，他說：「顧《學部通辨》但以朱子四十歲為斷；近日當湖陸氏，又以壬辰為始分未發、已發之年，恐皆有所未盡也」。¹¹⁷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童氏在該書的〈凡例〉中言：「是書專考朱子為學次第，其間淺深疏密、異同曲折纖析，逐年逐月皆有可見，即後學用心實不出此一途。……以此與陳氏《通辨》一書專為『朱陸異同』之論稍有別云。」¹¹⁸由此可清楚地看到他的寫作用心已能自覺地要求超越「朱陸異同」論中誰是誰非的門戶紛爭，而期許能直就朱子學思歷程的轉折與遞嬗來接引後學。

綜括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到「朱陸異同」論的學術發展脈絡，從明代中葉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為關鍵觸媒，引發一連串考述朱子學思發展歷程的論述，如魏校、高攀龍用心於梳理朱子參究中和問題的始末；秦雲爽在提出兩轉關之說外，復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為朱子的最終定論；陸隴其

¹¹⁴ 同前註，頁 31 下。

¹¹⁵ 同前註，頁 33 上。

¹¹⁶ 案：《西銘解》、《太極圖說解》、《通書注》三書請見《朱子全書》第 13 冊。諸本《朱熹年譜》均將《西銘解》繫於乾道八年壬辰（43 歲），至於《太極圖說解》、《通書注》兩書則繫於乾道九年癸巳（44 歲），但據束景南研究得出：《通書注》當作於淳熙十四年（丁未，58 歲）。見《朱熹年譜長編（增訂本）》，頁 488-489、871-872。

¹¹⁷ 《朱子為學次第考》，卷 2，頁 42 下。

¹¹⁸ 同前註，〈凡例〉第六條，頁 2 下。

以回歸經旨，求索文義句讀之妥貼為朱學的最終方向；童能靈則以朱子完成《太極圖說解》、《通書注》方是學問的圓熟等等。雖然不同的研究者，對於朱子的學問要旨之掌握有別，但是其中針對朱子學思演變歷程一核心課題的發揮，以及透過繫年朱子書信並就諸關鍵信件進行細膩的文義釐清之工作，逐漸成為參與「朱陸異同」論辯的必要討論方式。以至於本文前面兩節所論，清代康雍時期，朱澤澐與王懋竑兩人對於朱子學思歷程的不同看法，以及關於主靜與主敬的學問宗旨之爭辯，均可視為此學術議題之延續開展與共同治學手段的推行歷程，這也就是王懋竑會強調朱陸之論是《朱子年譜》之立譜關鍵的根本因由。

此外，雖以本文的觀點而論，朱澤澐與王懋竑兩人對此「朱陸異同」論議題的處理，已相當細緻、高明，具有指標性與總結性的意義；但實際來說，一學術議題的發展，不會到某個人或某部著作身上便嘎然而止，基於詮釋研究的開放性，此議題在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之後，仍持續地被討論下去，例如李紱（字巨來，號穆堂，1673-1750）不謹編輯《朱子晚年全論》、《陸子學譜》等書外，並創「朱子生平之學凡四變」之說；¹¹⁹且直至晚清，仍有學人參與此議題的討論，如夏忻（字心伯，號弢甫，1789-1871）彙輯個人闡述朱子學說之文章成《述朱質疑》一冊，書中倡議「朱子之學凡三轉」的看法，以駁斥李紱《朱子晚年全論》及修正王懋竑《朱子年譜》的論點。¹²⁰

¹¹⁹ 案：李氏所言「朱子生平之學凡四變」之內容為：紹興三十年（庚辰），因師事李延平先生，一變至道。四十歲以後，始棄延平之教，專意著述，此又一變也。五十三歲，始有悔心，欲守陸子所講為入德之方。六十歲以後則悉依陸子尊德性之教，此一變則朱子之定論也。見清·李紱：《穆堂初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道光十一年刻本），卷32，〈朱子不惑錄序〉，頁5。

¹²⁰ 案：夏忻的「三轉」說，分別是指從學延平、自悟中和舊說與己丑悟中和新說，但其主張在己丑之悟便已確立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為終身學說定論。見清·夏忻：《述朱質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咸豐二年刻本），卷5，〈與胡珣卿茂才論學部通辨及三魚堂集答秦定叟書〉，頁17下-18上。

五、結 語

本文以清代朱子學代表著作——王懋竑的《朱子年譜》為問題的出發點，即當前學界對於朱子學的研究多半肯定參究中和問題在朱子的學思發展過程中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尤其四十歲時的「中和新說」之悟，更是確立朱子學術思想的重要指標。然而王懋竑卻在該書中反覆堅稱「中和新說」為朱子未定之論，其根本原因究竟何在？針對這個問題的探討，無法從以往的文獻學研究（追索王氏之作所參照的《年譜》版本）獲得滿意的解答。因此，本研究認為當可從王懋竑編撰《年譜》時曾經參考過的同里學侶朱澤澐所著《朱子聖學考略》一書得窺其立論之因由。

蓋朱澤澐此作，不僅鉅細靡遺地詳述朱子學思發展的階段性進程，有中年時期中和舊說、新說之悟，復有五十七歲的動靜合一之境與六十一歲的心理貫通境界，甚至晚年六秩晉八更為通貫天人的大成時候；又特別發揮中和新說之義理內涵，強調未發時的心性涵養工夫，並倡議「以靜為本」的「主靜」說。

他更於此書完成後，特別寄予王懋竑討論，不料竟遭到王氏的強烈反對，因而引發一場對於朱子的學問宗旨究竟是「主靜」抑或「主敬」的爭辯。王懋竑也在往復辯斥朱澤澐之說的過程中，逐漸確立起自己所主張的：己丑之悟猶多未定之論，而朱子之學問當以庚寅年（四十一歲）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方為根本宗旨的論點。這些相關的論議觀點，最終清楚地反應在其《朱子年譜》中。於是可理解王懋竑《朱子年譜》的獨特論點其來有自，當是針對朱澤澐的《朱子聖學考略》一書而發的。

又在進行王懋竑《朱子年譜》的義理溯源之後，繼之追問王氏言其立譜之用心與關懷，稱「朱陸異同是作譜大關鍵」？因此，本文進而以朱子學思發展階段論為主軸，考察朱澤澐與王懋竑之前關於「朱陸異同」思潮的發展情形。

亦即「朱陸異同論」問題，於明中葉在王陽明編輯《朱子晚年定論》的激發下，學者紛紛就何為朱子真正的「晚年定論」，以及朱子學思發展歷程一議題，提出種種意見。如與陽明同時的魏校便提出「文公論心學凡三變」的說法，明末高攀龍也說：「朱子所見大約歷三轉而始定」，而清初秦雲爽更有《紫陽大指》之作，認為朱子平生得力在中和之說，而「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一語乃是朱子最後的晚年定論。秦氏之說遭到當時朱子學名家陸隴其的批判，陸隴其主張朱子之學有兩轉關，最終是「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之後」。爾後，於康熙、雍正年間，復有童能靈《朱子為學次第考》與朱澤澐《朱子聖學考略》這兩部著作，此二書同樣採取文獻繫年編纂的方式，詳細論析朱子學思發展的各個階段。童氏主張中和新說之悟固然重要，但至壬辰（四十三歲）以後嚴立心性之別，才是朱子思想的圓熟確定。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從《紫陽大指》、《讀朱隨筆》到《朱子為學次第考》、《朱子聖學考略》等等一系列關涉「朱陸異同論」之著作，均呈現出講究文獻實證的治學態度，以及透過文獻編年考訂以求有效解決朱陸早晚異同問題與朱子晚年定論為何的學術思潮，這股思潮可謂明、清兩代「朱陸異同論」的首要特徵，而朱澤澐的《朱子聖學考略》與王懋竑的《朱子年譜》兩書正是這個學術背景下的代表性結晶：前者，較往昔之作，更細緻地處理朱子學思發展階段論；後者則堅守文獻編年考證之路，完成深具參考價值的《年譜》之作。

故經過上述的梳理工作，將得見王懋竑《朱子年譜》的編寫用心（回應朱陸異同問題）與獨特觀點（中和新說為未定之論）的立論緣由。並且透過針對這個學術公案的發展脈絡之考察，不僅可以看到朱澤澐與王懋竑兩人對於朱子學問宗旨究竟是「主靜」還是「主敬」的爭議，同時也呈現出不同的研究者對於朱學宗旨或有不同的理解，如魏校、高攀龍、秦雲爽、陸隴其以及童能靈等人均有各自的認識與體會。如此說來，相信此研究成果，對於陷入門戶之爭、紛雜難定的「朱陸異同」問題能有所澄清，指示一個有助於通盤掌握的理解方向；同時也展示歷來學者對於朱學宗旨的諸多詮解，這不只能說明朱子學在明中葉以降受陽明學的挑戰與刺激後，所引發的學術波瀾，更代表朱子學持續推

展的生命力。惟在此諸多說法的介紹與整理之後，進一步當可回歸到朱子本身，推究其學思發展的軌跡與義理層遞、轉折的因由，而予諸說一適切的評判，當是往後值得繼續探究的重要議題。

（責任校對：邱琬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 宋·朱熹撰，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 宋·朱熹著，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 宋·張栻著，楊世文點校：《張栻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
- 明·羅欽順著，閻韜點校：《困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 明·王守仁著，錢明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明·魏校：《莊渠遺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集部別集第 216 冊。
-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集部第 231 冊。
- 明·黃宗羲、黃百家纂輯，全祖望修定：《宋元學案》，《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
- 清·秦雲爽：《紫陽大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5 年，子部第 22 冊，據南京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集部第 264 冊。

- 清·陸隴其：《讀朱隨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子部第31冊。
- 清·童能靈：《朱子為學次第考》，《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29冊，據清乾隆間刻本影印。
- * 清·朱澤澐：《朱子聖學考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46冊，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民國本影印。
- * 清·朱澤澐：《朱止泉先生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8冊，據清乾隆四年顧天齋刻本影印。
- 清·朱軾：《朱止泉先生年譜》，收入鄭曉霞、吳平標點，《揚州學派年譜合刊》，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
- * 清·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0冊，據清乾隆十七年刻本影印。
- 清·王懋竑：《白田草堂續稿》，《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0冊，據稿本影印。
- *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清·李紱：《穆堂初稿》，《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集部別集第1421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奉國堂刻本影印。
- 清·夏炘：《述朱質疑》，《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子部儒家第952冊，據清咸豐二年景紫山房刻本影印。
- 清·唐鑑：《清學案小識》，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

二、近人論著

-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臺北：正中書局，1990年。
- *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增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 束景南：《王陽明年譜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林慶彰：〈王懋竑的朱子學〉，《清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

* 容肇祖：《容肇祖集》，山東：齊魯書社，1989 年。

陳 來：《朱子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

* 陳 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年。

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顧亭林學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里仁書局，1995 年。

* 游騰達：〈論朱澤澐《朱子聖學考略》對「朱陸異同論」的文獻探析〉，《東華漢學》第 14 期（2011 年 12 月）。DOI:10.6999/DHJCS.201112.0110

楊正顯：《覺世之道：王陽明良知說的形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

楊 菁：〈朱澤澐的朱子學〉，收入祁龍威、林慶彰主編，《清代揚州學術》，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 年。

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

錢 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錢 穆：《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 年。

（日）山本仁：〈朱子學關係文獻の再検討〉，收入（日）有田和夫、大島晃編：《朱子學的思惟：中國思想史における伝統と革新》，東京：汲古書院，1990 年。

（日）友枝龍太郎：《朱子の思想形成（改訂版）》，東京：春秋社，2002 年。

（日）佐藤仁著，石立善譯：〈論李默本《朱子年譜》——與明代學術的展開相關聯〉，收錄於吳震、吾妻重二主編：《思想與文獻：日本學者宋明儒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美）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

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ien, M. (1997). *Qian Binsi quan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Qian Binsi].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 Chen, L. (2007). *Zhuzi shuxin biannian kaozheng* [A chronical textual research on Zhuzi's letter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Chu, X. (2002). *Zhuzi quanshu*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Zhu Xi's works]. J.-R. Chu and Z.-Z. Yan (Ed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Hefei: Anhu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Chu, T.-Y. (1995). *Zhuzi shengxue kaolüe* [Continue repairing the complete texts of the four repositories] (Vol. 946).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 Chu, T.-Y. (2010). *Zhu Zhiquan xiansheng wenji* [The Works of Chu Chih-Chuan, the collection of Qing poetry] (Vol. 218).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 Jong, C.-T. (1989). *Rong Zhaozu ji* [The works of Rong, Zhao-Zu]. Shandong: Qilu Press.
- Shu, C.-N. (2014). *Zhuxi nianpu changbian* [A long ver. of Zhuzi's chronicle].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Wang, M.-H. (2010). *Bai-tian-cao-tang-cun-gao* [The Works of Wang Mao-Hong, the collection of Qing poetry] (Vol. 220).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 Wang, M.-H. (2006). *Zhu Xi nianpu* [The chronicle of Zhuxi]. C.-L. Ho (Proofread).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Yu, T.-T. (2011). Lun Zhu Zeyun's *Zhuzi shengxue kaolüe* dui "Zhulu yitonglun" de wenxian tanxi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u Hsi and Lu Chiu-Yuan regarding "*Chu-tzu-sheng-hsueh-kao-lueh*"]. *Dong 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4, 109-148.

